

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析论

叶战备, 董 蕾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但其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的种种无序化表现也在不断阻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具体说来, 由于参与观念的利益化、参与能力的失衡化、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不足、社会媒体化加速、政府信息发布制度以及监测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因素, 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表现出了诸如非法化、非理性、失衡化以及虚假化等无序现象。为此, 我们需要从公民、网络和政府三个层面来谋求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进路。

关键词: 涉政网络事件; 有序; 公民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5) 06-0015-05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6.0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1]可见, 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是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是信息时代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新趋向, 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网络谣言的滋生、网络暴力的扩散等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无序化问题同样制约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由此,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也要有序进行。

一、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含义及特征

(一) 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含义

在界定“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含义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有序”进行全面的认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 有序即是有秩序。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2], 是“无序”的相对面。按照《辞海》的解释, “秩, 常也; 秩序, 常度也, 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 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3]从法理学角度来看,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4]。“在秩序状态下, 纷繁众多的各种因素彼此相互联系, 使我们从所熟悉的部分空间或者时间得出对于其余部分的正确期望, 或者至少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正确的期望。”^[5]我们在

此论及的“有序”是基于人(公民)这一行动主体, 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理性的一面和合理性的一面。从理性的一面而言, “有序”体现为公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 从合理性的一面来看, “有序”意指公民在参与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相应国家和社会规范要求的一种自觉。

就“涉政网络事件”而言,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但我们认为, 涉政网络事件是指网民群体围绕直接或间接由政务机构、政务活动以及政务人员引起的事项, 抑或某一政治议题、政治诉求等, 主要以发帖、跟帖和转帖关注以及围观的方式形成舆论压力, 其实质是通过在网络虚拟空间里的动员和集群, 诱致规模性、威胁性的非制度化参与活动。典型的案例如孙志刚案、厦门PX案、郭美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等等。

综上所述, 有序政治参与就是参与主体必须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实施参与行为, 其合法化、程序化和理性化的选择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所以, 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 就是指公民在网络空间的非制度化参与中, 能够自觉规避自身情绪化、无节制以及自利化的缺点, 做到合法、理性、平等和规范地参与。

(二) 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特征

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 收稿日期: 2015-08-20

作者简介: 叶战备(1970—), 男, 安徽桐城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ZZ015);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课题;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就现实层面来说,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合法化。合法化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重要保障。法律是国民意志的体现,理应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公民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自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其参政行为也必然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如果公民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了违法的方式或手段,则不但会影响该事件的顺利解决,更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例如,在著名的“启东事件”中,一些民众围堵、冲击市政大楼以及羞辱相关市领导的过激行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扩大影响力的作用,但却严重影响了该事件的有序解决,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就国家来说,正在积极加快法治化建设,这不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保障。因为只有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才能促进其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逐步内化,最终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和社会自觉。

2. 理性化。理性化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重要表现。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有自信与勇气地遇事不慌,且能够在全面了解和总结并尽快分析后,恰当使用多种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预备的或是临时的)中的一种去操作或处理,以达到事件需要的效果。所以,理性化作为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求公民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能够秉持公正的价值判断,恪守应有的道德底线,做出合理、明确和坚定的选择,不因外界纷乱的喧嚣聒噪和煽动性言论的鼓吹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公民很难辨别信息的真伪,在网络信息变得越来越易于操纵的情况下,其客观性更是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在情绪化的作用下,公民很容易做出非理性的乃至过激的行为。所以,理性化就对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但要求他们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绪,还要求他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辨别能力,这也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难点和核心所在。

3. 平等化。平等化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重要条件。古语有云:“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6]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只有相互亲近,做到人人平等,天下为大家所共有,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宪法

也明确规定了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不因年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因素差别而受限制。所以,公民应该平等地享有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权利,这是其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基础和前提。但就目前来看,平等化却成为了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难题。由于公民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电脑、智能手机以及网络的普及率依然严重失衡,公民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就存在着信息不平等和资源不平等的限制,而这种不平等一旦被激化,就很容易引发公民的情绪失衡及其无序化的政治参与行为。

4. 制度化。制度化是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重要要求。制度的变迁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更多是以一种惯习的形式嵌入文化遗产。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制度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选择。如果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制度是运营管理的保障,是机制形成的基础。如果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制度是秩序的根本保证。所以,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必然要具有制度化的约束,制度化是有序化的具体阐释。就当前来看,尽管我国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正在不断地完善,但总的来说,网络空间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网络技术的普及速率,制度外参与往往难以纳入有序的轨道,而这正是影响公民有序参与的不稳定因素。

二、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无序化的表征及成因

如果我们就上述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内涵来观照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现实,其无序化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一) 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无序化的表征

就目前来看,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还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良好愿景。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涉政网络事件表明,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无序化依然屡见不鲜。而这些无序化参与也具有共同的表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非法化。“网络是一个巨型的化装舞会,在这里人们隐去了真实的身份特征,而其行为也可能变得无所顾忌。”^[7]这就为一些不法分子的非法化参与提供了温床。在网络世界,他们可以肆意妄为,无视法律,并以此获取非法利益,而很少为此

付出代价。近些年来,一些境内和境外网站以捏造政治谣言的方式,蓄意攻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污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借机歪曲一些社会突发事件,恶意炒作,制造了不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舆论氛围。如邪教法轮功组织在境外利用互联网不停地散布各种虚假消息,企图“谣翻中国”,给我国政府和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 非理性。公民参政时的非理性行为表现在多个方面,而其中的人肉搜索可以看成是其非理性化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一种集中表现。尽管周久耕案、“表哥”案等人肉搜索的例子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人肉搜索所产生的危害。如2015年的“庆安枪击案”、2014年的“10·28广西警察枪杀孕妇案”、2013年的“花季少女投河”案件、2009年的“央视实习生”事件,加之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2008年的“女白领死亡博客”事件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06年“虐猫女”事件,人肉搜索的悲剧似乎在不断上演,网络社会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一再尴尬。盲目从众也是非理性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这种盲目从众的结果就是一边倒的群体极化现象。社会主义转轨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共存,贫富差距悬殊,群众的仇官仇富现象明显,这也是盲目从众的现实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事件的爆发,很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围观和共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会把这一事件引向更加非理性化的境地。

3. 失衡化。尽管互联网的普及率和覆盖率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可能因为无力支付网络费用或是不懂如何使用电脑而不能跨越“数字鸿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更善于利用网络来表达诉求;年轻人的网络参与率明显高于老年人;网络普及还呈现出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一致的“东部快、西部慢,城市快、农村慢”现象。这种失衡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会产生信息闭塞或信息不公,而这往往会导致极其不利的影响。例如震惊中外的新疆乌鲁木齐“7.15”事件,虽然说是由境外敌对势力挑拨煽动导致的民族矛盾激化所引起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西部地区的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的闭塞以及信息辨析能力的相对薄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利用的空间。

4. 虚假化。虚假化最明显的表现是网络政治

谣言的泛滥。“网络政治谣言是指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政治需要,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进行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它是国际、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和政治利益矛盾的产物,是政治谣言在网络上的反映。”^[8]当下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眼球经济时代”,一些媒体正在逐渐丧失其职业操守,出于阅读量或者某种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们利用转轨时期部分民众“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进行虚假报道,部分网民也出于种种原因肆意散播网络谣言,这就让原本无序化的网络参与变得更加混乱和虚假。例如,在云南火车站暴恐事件中,网上就出现了八种谣言。

(二) 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无序化产生的原因

1. 参与观念的利益化以及参与能力的失衡化。“只有当公民感到他的参与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获得积极的效果,或者免于惩罚,而不是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才会有参与的可能性,无论自主性参与,还是动员性参与,都是如此。”^[9]公民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往往对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件过度关注,如果没有有效的引导,很有可能导致参与无序化。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能力越强;受教育程度越低,参与能力越弱。而参与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质量,在相关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时比只有小学水平的人能更理性有序。但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等地方的公民所接受的教育还是参差不齐的。

2. 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不足以及社会媒体化的加速。主流媒体在传播渠道上偏重于党报党刊和传统媒体,大多擅长于宏观的、宏大叙事的内容表达方式,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绩宣扬的惯式思维,并往往逊色于多元化意见场域的较量、调谐与整合。但现在,分众传播、微传播成为受众接受传播内容的主要方式,也是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主要载体,主流媒体需要采用更开放的方式,进行更大平台上的整合。

社会媒体化最典型的表现是社交媒体的高歌猛进。从社交媒体的功能看,它是形成社会信息和意见流动的最好的技术平台,特别适合于不同意见的交融。但辩证地看,此种信息的传递也可能因为缺

少“把关人”而导致“井蛙观天”的问题,还极有可能在基于关系传播的基础上出现“党同伐异”的现象。

3.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及监测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就信息发布制度而言,中国政府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的建设已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在“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的知情权保障方面以及在第一时间的公开报道上,政府的相关媒体规定也早已出台。但政府因其自利性,对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也会进行选择性地发布,出于不想引起大范围恐慌的考虑也会选择隐瞒信息。也存在着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在遇到危机时,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维护小团体的利益或个人的私利,而采取说谎、瞒骗等方式来试图掩盖自身错误和问题的状况。

当下,政府对网络事件的监测力度不够。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网络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时候,政府才会关注到该事件。对于涉政网络事件缺乏事前的监控预警机制,而且关注的更多是事后的解决处理措施,而不去追溯该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和预防办法。殊不知这样花费的成本更高,而且根本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此外,1994年以来,虽然中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但是关于网络动员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很多时候依赖的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尽管近些年来随着《账号十条》、《微信十条》的颁布以及网络实名制的逐步推行,对互联网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规章制度的负面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规避。

三、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进路

公民无序化参与涉政网络事件是我国虚拟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所在,也是难点所在。公民的无序化网络参与对网络和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能放任这种无序化态势的进一步延续,而是要构建良好的网络和信息安全秩序,并对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进路进行积极探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涉政网络事件的相关参与要素——公民、网络媒体和政府——分别考虑。

(一) 公民层面

公民是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主体,其态度、权

利意识和参与能力直接影响到其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质量。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培育政治认同,促进理性化。一般来说,公民政治修养的高低,与其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着力从历史、现实、价值和话语的层面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促进其理性化参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他们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积极避免自身的情绪化。

2. 提高公共政策话语权,避免政治冷漠。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出台还是由政府主导,民众的话语权并不高。尽管有时候网民在自媒体上讨论得如火如荼,但真正能被政府有效采纳的建议还是少之又少。这种参与的挫折感最终很有可能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冷漠,同时又可能出现社会媒体的“泛政治化”。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分层协商民主的方式来提高公民在公共政策中的话语权,以当家做主的成就感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这不但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效度,还可以提高公民的参政热情,集结群众智慧,促进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3. 加大网络教育培训,提升参与能力。“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10]可见,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加大公民网络科学教育的力度,提高其信息运用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加强网络道德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为公民的有序涉政网络参与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网络媒体层面

网络媒体是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主阵地和风向标,其影响的是涉政网络事件的整个参与环境。所以,在公民网络参政越发表现出无序化迹象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主流网络媒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社交媒体的自身管理。

1. 加强主流网络媒体的建设。就我国的媒体体制和新闻体制而言,主流网络媒体具有信息上的优越性以及排他性,但这些年来网络谣言纷繁不断,与主流媒体建设的不完善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当前来说,主流网络媒体应该尽快研究新传播阵地上的传播规律和市场法则,并在更高的层次上积极履行自身作为公共表达平台的构建者、规制的维护者以及公共议题的设置者等角色职责,以夺取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2. 强化社交媒体的自身管理。作为新媒体主要代表形式之一的社交媒体,在这场“斗争”中,尤其要发挥自净的作用。正如《美国计算机协会通讯》上的量化分析:其他网络拓扑谣言的传播速度比社交网站要慢^[11]。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培养出社交平台内的“智者”——专家学者、资深网民和社会名流等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良好道德修养和较高知识素养的群体^[12],通过其庞大的影响力推动社交媒体的自身管理。

(三) 政府层面

从全局来看,政府是网络空间规制的主要提供者,公民有序参与涉政网络事件必须由政府主导,各参与要素积极配合、协同共治,最终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公民能否有序参政与其自身的参与能力和素质水平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政府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就政府层面来说,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改进信息发布制度,增强政府公信力。着眼于自身的功利性,注重成绩宣传的官方粉饰,各自为战且散乱无序的信息发布,不但不利于信息源权威的确立,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消耗。当务之急,政府要设法改变当前自身在信息发布中的角色固化单一问题。就像演出一台大戏,一场好的信息发布既要有名角,又要有“生旦净末丑”的杂色纷呈,同时还要有道德感召,这样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重塑政府公信力。

2. 建立预警机制和处置联动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包括四个环节:舆情规划、舆情收集、舆情分析处理、舆情预警。这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还要加大人力方面的投入。当然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通过服务外包来实现。建立网络舆情处置联动机制,就是要清除中国现行互联网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弊端。从宏观层面来看,在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的独立职能将得以发挥,随之地方网信领导小组和网信办也会协同跟进。从微观层面来说,要建立横跨各部门的地方政府网络事件应对机制,改变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应对网络事件的惯例,组建由宣传、纪检、公安牵头,各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当网络舆情爆发后,各部门快速反应,及时商量应对策略,形成合力,统一对外发声,防止出现杂音。

3. 加快专项立法,规范参与行为。“独立于政府”的媒体从来就没有,政府不仅是规范网络行为的权威主体,更应根据网络的发展趋势,建立并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美国先后颁布了《电子通信隐私法》、《通信内容端正法案》,香港也颁布了《个人数据保护条例》,对网络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为网络运行规定了边界和底线。相比较而言,我国目前分门别类的互联网管理法规还非常欠缺,尽管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可以为我们全面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提供依据,但在完善网络专项立法治理网络犯罪方面,我们还需要着力于:一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二是对网络紧急情况下政府管制网络的权力规定,三是对各类网站合法经营的管理规定,四是对网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其落脚点是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明确公民在网络表达上的责任,让每个网络参与者在行使表达自由的同时牢记自身所承担的责任,让违法行为和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在网络上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59.
- [3]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4008.
- [4]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7.
- [5] (英)安德鲁·甘布尔.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 [M]. 王晓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48.
- [6] (清)康有为. 大同书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89.
- [7] 茅亚萍. 浅析网络的匿名传播 [J]. 当代传播,2003(6):59-61.
- [8] 张雷.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 [J]. 政治学研究,2007(2):52-59.
- [9] 赵成根. 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69.
- [10] (苏)列宁. 列宁全集:第4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4.
- [11] Benjamin Doerr, Mahmoud Fouz, Tobias Friedrich. Why rumors spread so quickly in social networks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2(6):70-75.
- [12] 丁先存,王芑. 国外网络谣言治理及启示 [J]. 中国行政管理,2014(9):77-80.

【下转第27页】

